

巡守社區： 權力、衝突與都市地方政治*

莊雅仲

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
人文社會學系

本文探討都市鄰里政治，以及地方權力操作與競爭如何影響社區發展。文章從個人選擇、組織轉化與非正式的人際網絡，探討地方性的爭議，著重瞭解爭議過程的個人決策與社區想像，強調爭議雖然常引來厭惡與隱諱，不過卻必須放在一個追尋社區意義的脈絡來看，爭議和都市社區的政治經濟情況相關，牽涉到個人與集體性的情境感受。本文將在文化與經濟的界線上探討地方爭議與社區發展的辯證關係。

關鍵詞：權力，衝突，都市，社區，地方

* 感謝陳啟怡、林文凱、陳怡玲、容邵武、陳淑容與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的蔣斌先生對本文草稿提出的意見。本文初稿曾在暨南大學人類學所、花蓮教育大學鄉土文化所、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所、東華大學民族文化系、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與「法律、文化與社會」研讀會中做過口頭報告，感謝參與這些演講的同好們的建議，包括朱元鴻、陳毅峰、楊淑媛與林開世諸位女士、先生。由衷感激永康社區朋友們的協助，尤其是許多人的耐心與瞭解。感謝陳振賢幫忙繪製地圖，翁倖惠、夏瑞媛、劉皓寧、吳蕙如與鄧雅嬪提供研究協助。本研究承蒙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提供經費補助，特此致謝。

本文檢視臺北市大安區永康街周遭的鄰里區域（圖 1），¹ 探討居民的生活經驗與公共參與，這些居民特別包括了一般住家的家庭主婦以及在當地經營零售商店的「頭家」們。筆者會格外注意這個都市社區，乃因九年前（1995）這裡的社區公園保護運動曾在臺北市引起一些騷動。接下來的幾年內，當時參與保護公園的行動者們，成立了一個市民頗耳熟能詳的「永康社區發展協會」（以下簡稱「永康協會」），繼續奉獻心力於公園與社區的再造，並積極參與跨社區合作，介入一個全市性的草根社區運動與市政府的社區政策之制定和執行。

在 1997 至 1998 年之間，筆者曾在此地進行一年的田野工作，除瞭解當時的永康公園保護運動以及因此而成立的永康協會，並調查長達三年的社區再造過程所牽涉到的地方認同之形成與專業知識的介入。不過當筆者在 2002 年再次回到社區進行暑期田野時，地方組織分化與人事的消長變遷卻吸引了筆者的注意。在分別詢問各方意見、試著瞭解數年間社區於公共事務上的意見分歧所導致的紛爭的同時，筆者也探索社區生活的私人面向，以瞭解這些紛爭背後所隱含的人際網絡的動態關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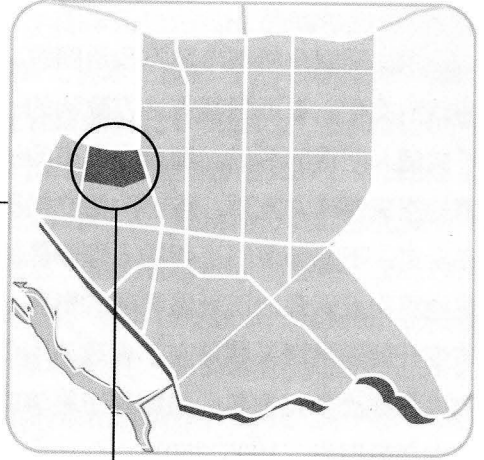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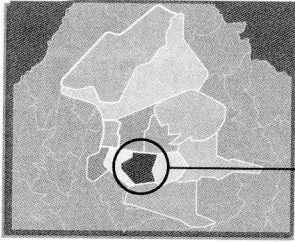
筆者在 1998 年的里長選舉過後離開永康社區，返回美國完成博士學位，並為文分析 1990 年後半永康社區的社區認同與一個新的都市政治。當 2002 年再度來到社區時，驚訝地看到一個完全不一樣的狀況。經過 2002 和 2003 年夏天的調查，發現原來的永康協會在一連串的事件後，雖然許多當時擔任理事的媽媽們感情仍在，不過幾年前永康協會所建立起來的信用與力量卻好像已經煙消雲散。相對地，地方許多不同的勢力竄起，比如跨越永康街兩個里的里辦公室在新里長的帶領下，創造出一番新氣象與新勢力，另外還新成立其他商業與店家組織，各自活躍於地方和市政的舞臺。

筆者將會在接下來的章節中討論這些新的情勢發展，地方組織的分裂與人群的聚合，必須放在城市變遷的脈絡來看。從 1990 年代末期開始，我們在永康街附近看到一個新的地方發展趨勢——亦即地方空間的商品化。這一個新趨勢改變了 1990 年代社區運動的進程，後文將討論一個重新整合的新鄰里政治及其新的動員過程，除了資本的進一步介入外，我們也看到新社區意識中產生的文化與人際關係如何影響這些動員過程：個人與集體如何回應這個趨勢而影響到人們的政治決定，因此也決定了合作或衝突，同夥或分裂，進而改變都市社區

¹ 關於本文中的地名與人名，筆者如果認為當事人會因為其從事的活動而感到高興的，就會提供真名與真實處所名稱，以保障他們的共同作者權。可能會有保留的，就以假名代替，或隱其名。

◆ 台北市

◆ 大安區



◆ 永康社區



圖 1 臺北市大安區永康社區的鄰里區域 (陳振賢繪製)

的面貌。本文將說明類似的地方衝突與分化必須放在這個區域的社會經濟變遷來看，尤其是不同群體與個人對這個變遷趨勢的感受、評估與決定。

一、定位政治

本文試圖分析都市地方政治問題，瞭解一個轉型中的都市鄰里政治與相關的政治文化。最近對都市地方政治的一個普遍誤解是，認為都市化造成新的原子式個人主義的形成，顯現在都市政治的是原有派系系統的瓦解，因此形成所謂的空氣票或文宣票，或者政治立場不明顯的中間選民。這樣子的見解雖然不完全錯，不過卻忽略了新的人際關係的建立和舊勢力的重新集結過程，以及這些過程對社區政治與社區發展的影響。一些學者的研究已經指出了這個錯誤，像陳東升就認為派系關係在都會政治中仍具有相當的決定性，他批評都市發展研究中的經濟多元主義，強調都市經濟的權力面向，並試圖尋找這個權力角力中的主要參與者（1995:350）。

不過因為陳東升主要著重探討都市外圍的都市化過程中，舊勢力的新活動，因此較不處理新政治勢力的崛起過程；他同時也認為臺灣的都市政治「不像西方國家的政治部門利用不同的方式與資本階級結合以營造地方經濟持續繁榮的情境，而主要是在不同的都會地區以空間所創造的經濟租金來鞏固各個民間部門的利益團體對於威權國家的依附與支持」（同上引:59）。換句話說，陳東升強調國家角色的主導性——即使他認為只是相對的，這一個強調促使其放棄傳統政治研究的多元論。多元主義的社區權力研究強調不同勢力的折衝過程，認為社區問題牽涉到不同議題與不同資源的運用過程，因此其決策的過程也就蘊含不同勢力在某種遊戲規則下的權力角力（Dahl 1961；Polsby 1963）。陳東升也批評政治經濟學的觀點，不認為國家機器只是與資本合作的「執行委員會」。

本文從都市核心區域的民族誌研究出發，卻提供一個不一樣的圖像。都市政治經濟學研究基本上還是一個有用的分析起點，Logan 和 Molotch (1987) 提出成長機器的觀念，筆者認為他們的地方商品化概念，提供了分析永康街鄰里政治的一個起點。陳東升認為在臺灣的都市脈絡中，成長的關鍵力量還是行政機器，因此「都市行政體系才是成長機器」（1995:9）。不過，臺灣在 1990 年代的政治社會轉變，使得類似國家中心以及發展導向的分析架構有必要修正，本文將討論資本與政治力量的一個新關係——類似的侍從關係其實正在解體之中（王金壽 2004），代之而起的則是一個新的資本形式與新的市民社會的表現——

以重新考慮陳東升《金權城市》一書裡所談的都市情況。Logan 和 Molotch (1987)則提出了一個比較複雜的架構，來說明一個由商業團體、政治人物與其他周邊力量組成的成長聯盟，同時他們也試圖說明社區組織的可能回應方式。

其實早在 1970 至 1980 年代間，美國的都市社會學家就曾熱烈地討論過都市政治經濟學的理论架構。David Harvey (1985a, 1985b) 的兩部曲大作提供了一個相當完整的馬克思主義架構，來理論化資本主義都市形成與發展的問題；Manual Castells (1983) 則指出都市社會運動與社會變遷的關係。Logan 和 Molotch 承續這個馬克思主義傳統，他們兩個人合著的書 *Urban Fortunes* 就討論都市做為一個成長機器和地方政治之間的關係，認為地方的商品化威脅地方使用價值與認同。不過他們也批評馬克思主義的都市社會學忽略了都市政治行動的可能性 (Castells 的書可能是一個例外，不過 Logan 和 Molotch 仍然認為他過度簡化了社會結構與都市政治和草根動員之間的關係)。對 Logan 和 Molotch 來說，政治行動必須被帶入都市的政治經濟學分析中，從中都市學家可以瞭解都市生活與都市發展之間的關係。

筆者的研究案例顯現出一個類似的多邊動態關係。*Urban Fortune* 這本書引導我們注意社區組織可能的複雜化過程，任何社區組織剛建立時的理想都得經過內部與外在的持續試煉，研究者必須小心探討其在新狀況下的轉變，尤其是這些狀況常牽涉一個全市性的成長機制。Logan 和 Molotch 的觀點讓我們可以從一個組織性的成長機器觀點來看前面提到的空間商品化的過程，永康社區的案例顯示，這一個成長機器由商業協會、社區協會、專業顧問公司、里辦公室與市政府的商業發展部門組成。

Logan 和 Molotch 的研究雖然提供了一個同時具有深度又綜合性的架構來觀察地方爭議，不過他們兩人過度將這些爭議視為地盤之爭的作法——亦即他們所謂使用價值與交換價值之間的對立——卻是值得商榷的。雖然 Logan 和 Molotch (1987:38) 批評 Castells 太過浪漫地看待都市動員的作法，認為不見得所有在都市的動員都有其都市性與進步性，不過 Logan 和 Molotch 卻忽略了集體性的文化意義之爭所可能具有的批判意涵，使得他們只能體認到社區組織的困境與矛盾，卻無法提供一個理論介入的出路。同時 Logan 和 Molotch 認為成長機器的相關組織皆會同意一個「價值中立」的成長導向的地方發展策略 (同上引:32)，也忽略了即使在成長聯盟內部，某種複雜性也是可能的。在另一本討論成長機器的回顧文集裡，Jonas 和 Wilson (1999) 認為這個忽略主要是因為 Logan 和 Molotch 對文化與意識形態的粗淺理解，致使二人無法深入探

討「成長機器透過什麼樣的語言力量，形塑日常的社會生活」(同上引:8)。這正是後文有關權力／論述的都市政治討論中要著墨的。尤其臺北的例子顯現出雖然成長或許是一個共同追求的目標，資本投資也被視為好事，但是一個共同的決定仍然不易從單純偏好淨資本值的增加中達成。換句話說，所謂使用與交換價值的對立其實不能簡單轉換成是成長機器和社區之間的對立 (Logan and Molotch 1987:99-146)。尤其，自從 Jean Baudrillard (1981) 後，使用價值很難再被看成是社會抗爭的基礎，反而應該是一個符號的政治經濟學的結果。

Logan 和 Molotch 的書產生的一個問題是 (這其實也是大部分政治經濟學研究的問題)，雖然他們已試圖說明「人的行動如何是一股都市發展中的力量」以及「將地點看成是人的行動的一個基本的物質成果，承認地方是社會的產物」(1987:11-12)，不過 (地方) 行動的問題之討論在他們的書中仍然太過抽象與受限，尤其在這些行動中形成的都市政治。這造成都市政治經濟學研究的一個理論缺口，某種在 Andy Merrifield (2002) 筆下形容的馬克思主義和都市主義之間的隔閡，都市行動仍被視為要不是反動就是容易消失於有關資本的結構分析中。這一些缺失正是本文著墨之處，這篇文章將聚焦於分析人的決定、行動與想法在這場都市鬥爭的效用與限制，反省一個具有行動取向的都市政治研究。

筆者認為檢討傳統人類學對權力的定義——亦即「某種改變別人行動與決定的影響力」，可以提供不一樣的權力觀念來看這樣一個行動取向的都市地方政治研究。人類學家向來不把權力視為靜態的與機械的運作，古典的政治人類學急欲尋找對於跨文化的秩序建立與衝突解決的理解，很早以前就從一個綜合性的觀點看待權力：既是政治的、經濟的，也是道德與儀式的 (Cohen 1969:162)，同時權力也是一個動態過程的操作，而不只是固定的規範 (Gluckman 1956; Turner 1996[1957])。這些想法依然有用，不過對一些人類學者來說，Foucault 對權力的革命性看法是一個重要的反省起點。Foucault 將權力視為某種不均勻的關係場域，使得研究者得以掙脫將權力視為某些人或團體的擁有物的理論困境，這個困境讓政治研究陷入某種形式主義，或是成為詢問「誰統治」的理論個人主義。相對地，對新一代的政治人類學家來說，Foucault 的權力觀念使得我們得以檢視行動、言語與事件的始末，開展某種權力／論述的分析途徑，權力被定義與定位成「權利規則……提供某種權力的形式界限……權力產生與傳遞的真理效應……然後再製權力」，而「多重權力關係穿透、形塑與建構社會軀體……但沒有論述的生產、累積、流通與運作，權力本身卻無法形成」(Cheater 1999:4, 引用自 Foucault 1980:93)。Foucault 的這個權力／論述的說法跳開

國家機制所構成的範圍界線，揚棄了韋伯式的將權力與權威分開的作法；換句話說，從「誰統治」的權力有無問題轉變成是論述分析中建立的權力地圖。

這些反省有助於我們理解本文所處理的地方衝突，不過基本上還得做一些調整。晚近政治人類學的發展試著重新閱讀古典理論，並和新的權力理論進行對話，基本上希望可以瞭解特定具體脈絡下權力是如何運作地，尤其在較複雜社會的社會形式中 (Vincent 2002)。類似的重讀因此希望可以調整 Foucault 太過大範圍的權力論述形成，Cheater (1999) 提到許多人對 Foucault 的批評，比如 Wikan 認為太過注意論述有許多缺點，忽略了交互主觀的共振中共享的人類經驗(同上引:5, 引用自 Wikan 1993:208), Cheater 認為 Foucault 的論述分析因此忽略了具體的情境與個人，尤其是個人的行動、發言與想法。不過，Cheater 也試著說明 Foucault 的理論並非不相容於對個人的注意 (Cheater 1999:3)，甚至認為 Foucault 的權力理論和政治人類學的交流理論 (強調個人 在互動過程中的策略運用, cf. Bailey 1969) 其實可以互相比較。Gledhill 雖然批評 Foucault 的理論太過「從上而下」，不過也認為 Foucault 的理論不只和論述有關，而且也是權力的「策略、技術與程式」的理論，有助於我們對於歷史的結構與能動性的瞭解 (Gledhill 2000[1994]:150-152)。

本文分析重點即是個人的行為、策略、思考與情感展現——權力的瑣碎世俗性，注意類似日常性的權力關係，帶我們進入地方的政治經濟學與地方文化想像之間的交會地帶。Cheater 談到後現代的權力概念忽略了資源的有限性以及權力的階級性，而 Foucault 將權力關係視為「某種論述生產、累積與流通的結果」基本上避談政治經濟的問題，並且刻意揚棄意識形態、國家與階級等馬克思主義的概念 (Foucault 1980:109-133)。Foucault 的理論和政治經濟學之間的緊張關係事實上掩蓋了許多原可以有豐碩成果的研究取向，Wolf 提到他所說的「結構的權力」時也說：「傅柯自己主要將之看做統治意識的權力，但我想使用它來指建構政治經濟的權力……。這個詞重新定義『社會生產關係』這個較舊的觀念，強調權力佈署與分配社會勞動的面向，如果只從互動的觀點來看權力，這一個統治的關係不會出現，結構的權力形塑社會的行動場域，所以可以決定哪些行為可能，那些是較不可能或絕不可能」(2002:223)。

這正是本文討論永康社區之都市政治的基本主張，微觀政治過程的技術操作其實是論述／權力的結果。筆者將從社區意識的興起與里政的轉進和反擊過程中，探討新權力如何在都市文化論述的轉換過程中形成。「社區」在 1990 年代重現，代表某種地方想像的再創造，具體呈現在地方勢力的消長過程中，促

成新的地方領導模式（莊雅仲 2005）。本文將進一步討論這個地方政治如何在新的商業利益的介入與都市空間商品化的過程中趨於複雜，捲進新舊勢力，分別企圖在新形勢中取得上風。對這樣子的地方勢力的衝突、競爭與謀合的研究，必須扣連住對新的都市生活論述的理解。本文主要討論人行步道空間與交通動線的生活實踐，以及商圈營造的在地發展，希望可以因此釐清新的地方團體與人際網絡構成的細微政治過程。

後文中，這些日常細微的過程將包括社區巡守隊集結的動力分析，而且筆者也將討論流言在這個權力過程中扮演的曖昧角色。筆者認為巡守隊的興起與擴張代表上述都市論述底下的一個新的權力地圖，體現出這個新權力機制如何巧妙地運用都市空間、人際距離與家庭意象。另一方面，流言則流轉於這個新權力結構的夾縫中，是地方不同勢力遭遇過程的產物，亦是權力的另外一個場景，和原先的權力結構共同構成一種既增強又破壞的互動關係。

二、社區與里政

筆者曾探討 1990 年代臺灣的政治環境與永康街當地的特殊地景及人際網絡，以瞭解當時的社區重建運動的力量與限制（同上引）。1995 年永康公園因為一個新的道路興建計畫而即將面臨拆除，但因附近居民的積極介入而得以保存，並由此展開一個長期的社區重建工作與組織化過程，誕生了當時普受重視的永康協會。許多家庭主婦和年輕的自由工作者積極地參與，也受到一些專業團體的支持。²

當時的組織者試著從都市生活的片段元素中，包括個人記憶、空間意象與不經意的人際交換，重新創造出某種社群生活感。而且因為都市生活和這個社群生活感之間的隔閡，因此這個運動包括一連串介於這些既有元素與個人（和集體）創意間的衝撞。有人提及傳統社會中的廟埕功能，並刻意在公園重建中營造一個凝聚人群的空間：在 1990 年代中期的那段時間裡，永康社區是臺北市率先在鄰里公園裡舉辦諸如包湯圓與音樂欣賞等活動的幾個地方之一。除了穿越的功能外，街道也成爲一個創作空間，例如有次永康協會就選定了一條在當

² 永康社區在日治時代爲殖民地的官員宿舍區，戰後國民政府接收，大部分屋舍仍充作公務員宿舍，大規模的人口移入從 1960 年代中期開始，隨著一棟棟公寓的興建，逐漸容納了許多外縣市的移民，參與公園保護運動的居民大多是這些新移民。

地被稱為遊戲巷的巷子，將之整個鋪上白色的畫布，成功地吸引了許多家庭帶小孩出來，在畫布上做出他們對社區空間與生活的想像。

類似的活動象徵某種民眾自主力量的集結，不過之前的研究太過於浪漫化這些新興的勢力（比如用覺醒或深化民主這些較抽象的概念），以致於沒有辦法看到那些使得這些力量成為可能的政治社會變化與地方內部勢力的爭戰和消長。後文將處理這個新興勢力的分裂與衝突，以及一個重整過後的政治力量（尤其是以「里」為單位）的反擊。

前一節對權力的理解，提供了一個架構來說明永康協會勢力的興起與分裂的社會脈絡，顯示權力的構成與轉進和一個社區論述的形成與轉換有關。永康街的例子透露出當時這個新興勢力的力量以及限制，用研究社會運動學者的話來說，1990年代的民主化開啓了某些政治機會（Tarrow 1998）。不過這些政治機會還須經過一番轉折才能轉換成地方性的動員力量：其中之一當然是伴隨著民主化過程中對於「鄉土」的注意，這同時引起了官方與地方性的回應。目前一般的共識是李登輝在1994年發起的生命共同體論述與相應的社區總體營造政策，提供了一些必要的資源、說法與公共的注意。在臺北市，這股潮流剛好搭上1994年底陳水扁選上市長後的「市民主義」政見，「社區」很快成為這個新口號與論述的承載者。

不過，在永康街興起的地方認同（1995至1998年期間）卻無法單以這些官方的政策實踐來解釋。筆者曾在別處提到社區組織與專業規劃者如何在歷史、空間與人際網絡中實驗創造新的「社區」意涵，這些社區意涵在多樣的地方經濟與空間結構和人口組成中被測試著，面對複雜的社會問題，衍生出不同的論述與行動（莊雅仲 2005）。永康協會因此得在敏感與多變的狀況中見招拆招，形塑轉化人際交往內涵與建造地方的公共性。不過，在新的市府方案的協助下，社區發展協會在許多地方事務上的確扮演著主導的角色，積極干預原來鄰里的權力行使。³

由於公園實際上位於水岸里（西）與榕樹里（東）之間，因此公園保存運動孕育出來的永康協會「自然」以這兩里為界線。不過這個劃界的行動，仍然經過一番爭取與折騰。當時的臺北市刻意規定四個里只能設置一個社區發展協

3 在1990年代中期，里長的角色基本上還是扮演消極的社區事務通報工作，很少有積極的作為，社區發展協會的創立在很多時候複雜化了地區代理人與代表性的問題，種下了後來許多爭議的因子。1990年代末期，更有許多社會運動團體積極介入里長選舉，開闢草根運動的另一個戰場。

會，由於當時兩里在官方記錄上已屬於龍山社區發展協會，因此一開始官方並不承認永康協會，一年後這個禁令才在居民抗爭下打破。隨後四里只能設置一個社區發展協會的禁令也全面取消。在這個情形下，社區發展協會與區里兩系統的平行發展，造成地方政治的複雜化。雖然社區發展協會屬自願性的社會團體，不過卻常介入地方事務的運作並左右地方意見的形成。里長雖屬於行政系統，卻因為其民選的性質，使得里長同時也是地方意見領袖。這造成兩個系統之間的運作與功能上的高度重疊，更複雜化了地方政治操作。

永康街區域的種種問題都和這個複雜的地方政治過程有關。原先積極參與的永康協會的媽媽們與年輕的組織者，必須隨時面對各種地方問題的出現與不同勢力的挑戰，很多都和當地繁盛的商業環境有關。在永康街，這些地方商業力量結合重整的里辦公室力量，積極介入地方事務：例如 1999 年中，因永康協會欲加建公園左側的一條人行文化步道，衝突因此擴大。由於擔心步道影響停車，阻礙顧客上門，公園周邊的店家主人群起反對步道的興建。同時，這個衝突因為新任榕樹里里長福嫂採取某種超乎永康協會成員預期的方式處理而使問題更形複雜。因為榕樹里里長福嫂原也是永康協會的成員，許多媽媽都曾大力幫忙並支持她當選，原希望可以因此整合永康協會與里辦公室。⁴ 不過新任里長某種程度上倒向反對文化步道的力量，除導致內部的衝突外，對外更有店家主人所主導的反對力量的掣肘，形勢越來越艱困。往後的幾年間，永康協會成員和榕樹里里長之間展開多次的攻防戰，介入的店家主人們更主導成立了另外一個社區發展協會——永福生活圈社區發展協會（以下簡稱「永福協會」），以便和原有的永康協會抗衡。

另一方面，永康社區涵蓋範圍內的另一里——水岸里，雖然其老里長並不積極管事，不過 1999 年本地爆發了捷運聯合開發案抗爭，在當時還是水岸里鄰長永哥的帶領下，當地居民的力量獲得整合，成功保留了水岸里信義路段原街道的使用情形。許多參與的屋主（多是男性）在永哥的帶領下成爲一股新的社區力量，開始積極介入社區事務。這或許是世紀之交本地最大的事件之一，這股新興的力量加入新的永福協會，因此兩里的行政與商業力量得以暫時統一（永哥也在 2003 年初順利當選水岸里里長）。2000 年永福協會取得市政府建設局商業司負責的新商店街輔導計畫的補助經費，市政府計畫以三年時間，補助約三百萬元的經費，在當時算是這個新的協會的重大成就。

4 永康社區範圍包括兩里：榕樹里與水岸里（皆是假名）。里長名字亦是假名。

諸如此類的地方政治的複雜化，使得筆者重新開始思考 1995 年後永康協會興起的過程。以反對道路開闢為訴求的開始，前面已經說過，永康協會在組織活躍的三年間，主要致力於尋找某種地方認同，並著重重建參與者對社區的瞭解與感受。不過如果回溯近幾年複雜的政治發展過程，永康協會在那三年取得的地方事務的主導性以及道德的高點，卻值得玩味。對很多研究社區營造的人來說，類似的挫敗似乎代表著原來永康協會社區著力的深度不夠，因此使得運動的成果不易落實。這樣的說法不見得不對，不過筆者在本文卻要強調地區經濟的變遷，這個變遷和地方勢力的消長特別有關，尤其是對永康協會的工作及其阻力之間的關係。

做為一個居民自發的地域性組織，永康協會在當時特殊的政治氣氛下，加入了一個轉變中的社區空間商品化的過程，這個過程引起了一連串的連鎖反應，進而創造新的政治環境。早在 1980 年代，永康街這個區域的業種就正在經歷一個關鍵的轉變。永康協會本身曾進行過一個調查，發現 1980 年代中期以後，社區基本上進駐了許多文物古董與精品服飾店，原就興盛的餐飲業也傾向多元精緻化，十年下來永康街道地景與生活樣貌也因此改變頗多。上個世紀末的最後五年間，這個趨勢更加急劇化，當時原居於反對黨地位的民進黨上臺，使得市政朝向一個新的作風，新官僚配合興起的市民組織致力於許多改革，加上交通黑暗期漸過，選舉導向的社會福利措施多方就位，1997 年的統計已顯示多年來持續下降的人口數首度回升。在永康街區域，大安森林公園與永康公園的相繼落成更開啓了一個房地產的黃金時期。很多人認為 1999 年「冰館」芒果冰的爆紅帶動了區域的繁榮與觀光人潮，不過這個趨勢其實在 1997 年時已很明顯，當時筆者曾協同永康協會的人訪問附近的店家，許多新店主已挖空心思搜尋創意點子，顯現旺盛的企圖心。

永康協會曾在 1998 年試圖協調各業種的店主共同商談地方發展大計，只是仍不免太過一廂情願，結果參與者寥寥無幾，也因此喪失了提出一個在地商業策略的先機。而且永康協會一直以家庭主婦為主體，先天上對於商業活動不夠熟悉，在許多事務上甚至有嚴重的歧見，比如路邊停車與交通管制問題。筆者後來的調查也證實，這個歧見一直是永康協會三年主導過程中的暗流，且最後終於導致協會的分裂。

三、人行道的政治學

永康街附近社區的發展與空間商品化過程，導致認同與權力的抗衡以及利害與理念的爭議。1995年永康協會的影響力，在全球消費、全市政治、地方生活與地區商業環境改變的脈絡下展開，不過商業化趨勢的更加急劇也導致這個權力的潰散與新勢力的興起。這些不同勢力以不一樣的行事風格、價值判斷、願景評估與資源動員試圖站穩腳步；換句話說，政治經濟情況轉換中所牽涉到的交換價值與集體消費變動的階級問題，其實也是個人或團體主動的論述／行動的原因與結果。在永康街，類似的全球狀況與地方回應的遭遇，具體顯現在不同的社區爭議與問題中，包括街道使用的爭奪，以及下一節我們要談的交通需求與居家安定的拉鋸中。

街道問題導致永康協會的分裂與地方不同勢力的角力。對筆者來說，類似的政治過程的複雜性，絕對和地方經濟有關，不過這個地方經濟得從一個多面向的意義框架來解讀。換句話說，輕易將永康街的爭議看成是家庭主婦與店家主人的對立，因此是 Logan 和 Molotch 所說的使用價值與交換價值間的對立，並不足於理解這樣子的衝突。筆者真正想瞭解的是這些衝突過程如何關連到一個有關都市文化的論述形成：這個論述的形成特別和權力的部署、組織的分歧、戰術的運用與個人的領導藝術相關。

在 1999 年初，永康協會公園重建運動的最後一個主要項目——也就是公園西側的文化步道的建造——成爲爭議焦點，在四月二十四日召開的里民大會裡，榕樹里里長和永康協會的某些成員展開議事攻防。雖然榕樹里里長是 1998 年受到永康協會的支持而當選里長，不過選舉過後，新任里長開始對文化步道的興建表示異議，認爲這個施政項目當初並沒有得到全部會員的認可。參加這次里民大會的永康協會成員，在人數優勢的考慮下，提出表決動議，要求里民大會認可文化步道的興建，同時也希望促使里長表態。動議以壓倒性的多數通過，不過因爲里民大會的決議只是參考性質，並沒有法律的拘束力，同時參與人數也僅佔約三千八百位里民的極少數（一百七十位左右），因此爭議並沒有止歇。

文化步道之爭結束了永康社區自從 1995 年來四年的懵懂蜜月期，1999 年四月之後的衝突開啓了另一段社區的爭議期，首先當然是永康協會的分裂。前面已經談及，榕樹里里長當選後，和永康協會之間因故產生齟齬，雖可看成是行政體系和草根組織之間很難避免的角色衝突的結果，不過如果進一步瞭解的

話，卻是一次如假包換的內部分裂。永康協會原來的媽媽們可說是一分為二，分別跟隨其信任的領導者並參與其喜歡的團體。另一方面，漸漸嶄露頭角的地方店主們，則在 2000 年時籌組「永福生活圈發展協會」，這個重新集結的地方店家勢力和新的行政勢力結合，很快成為當地新的主要政治力量。這個新的地方勢力掌握了內外的資源與人力，不過卻難逃繼續分裂的命運。

理解這一連串細微政治過程，可以幫助我們釐清前述有關地方的政治經濟學討論留下的問題：都市發展機制的地方運作的日常過程到底為何？換句話說，資本與地方的接觸介面的問題。前文已經說過使用價值與交換價值的對立不足以解釋上述衝突的日常複雜性。類似永康街附近這樣的住商混合社區，在臺灣的脈絡裡，一向呈現出非常複雜分歧的生活風格、需求與利益的衝突，這樣的歧異性提供機會讓研究者可以瞭解影響地方生活與想像的內外因素。Doreen Massey 曾提到所謂的地方感 (senses of place)：「地方沒有單一獨特的認同，認同常充滿著內部的爭議。想想倫敦的 Docklands，此刻很明顯是被衝突所定義，這些衝突包括地方的過去(遺產的特質)、現在發展與未來的願景等問題」(1994:155)。對 Massey 來說，這些衝突與歧異性正是我們要瞭解一個全球觀點下的地方感的關鍵。

永康街的地方性鬥爭和美好社區生活的想像有關。永康協會過去四年來的家園營造，在衝突過程中受到質疑，2002 年夏天當筆者重回永康街的時候，偶然的機會拿到當地一位居民自己發行的小冊子，裡面批評永康協會在那幾年「胡作非為」，徒然阻礙了社區的進步。筆者也和新的永福協會的成員接觸，其中有的人認為當初永康協會對社區發展的規劃太過夢幻與不食人間煙火，例如筆者曾在 2003 年時訪問一位當時反對興建文化步道的地方領袖，他客氣地說當時永康協會的人太過理想天真了，不過言下之意則是少不經世與「婦人」之仁；有的人則直接說「做作」，不像現在團體比較務實。

從 1999 年四月底的里民大會後，不管在正式場合還是街頭巷尾，雙方的攻擊火力不減，這個地方爭議甚至驚動媒體報導，甫上任半年的馬英九市長也要求慎重協調。永康協會召開臨時理監事會處理，新任里長也是理事，不過並沒有出席。與會的部分理事認為文化步道早已是既定的政策，質疑為何里長對外發表和內部決議相反的言論，理事會因此決定去函區公所要求儘速執行，永康協會並隨後散發傳單質疑里長的公正性。

榕樹里里長則聯合當時的水岸里老里長，廣發傳單表達反對步道興建，並質疑永康協會在里民大會上發動的決議，不管是程序或實質都欠缺考慮。八月

二十一日當天的公聽會，永康協會遭受無情的炮火攻擊。當筆者在三年後(2002年)訪問榕樹里里長福嫂時，她提供了一捲當時所拍攝的錄影帶，並說明那時候實在是大部分的人都反對興建步道，福嫂做為里長只能傳達大家的意見，並將一捲錄影帶拷貝寄給市政府，意見中包括永康街本來就不寬，步道將造成車子更難通行等等問題，而且公園內原本就可以供行人通行，沒有必要在旁邊再蓋一條人行道。從錄影帶裡，筆者的確看到許多人此起彼落發言反對興建步道，有些人還非常激動，甚至出言不遜，其中大部分是當地男性店家主人。永康協會的一位老成員接受筆者的訪問時，戲稱這些男人們為漢子，大辣辣地說話，不假修飾，和原來永康協會媽媽們的溝通方式形成強烈的對比，媽媽們多是輕聲細語地說話，然後話語傳遞流轉於不同的小團體中。

這些衝突和社區狀況的轉變有關——包括資源的形成與掌握，不過筆者要再次強調，所謂資源的形成與掌握所構成的多重權力關係，必須視為「某種論述的生產、累積與流通的結果」。換句話說，行動中的策略與決定必須放在一個「社區」論述的形成中來理解，如同 Wolf 所說的「結構的權力」可以決定哪些行動較有可能，哪些又較不可能發生：我們可以從步道在永康街社區的歷史看出一些端倪。步道之爭其實有一段歷史淵源，1997年公園重建運動進入最後的設計與發包階段，為解決公園西側非法停車導致行人無法安心走路的問題，永康協會希望能在公園圍牆外興建一條一點二米寬的人行步道，當時由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的一位研究生負責，並且動員社區居民一起參與設計過程，最後並決定進行公園西側以及南側外牆的牆面美化，人行道便由此改稱為文化步道。步道的設計與建造代表了永康協會長達三年所奮鬥之理念的落實，一方面當然是整體行走空間的改善，另一方面則是居民的參與精神。筆者曾參加過一次步道的設計公聽會，的確吸引一部分的居民出面提供意見，永康協會最後決定西側的牆面由國立臺北師範學院的師生進行公共藝術的創作，並以永康街區域的歷史變遷為主題。南面的牆壁則由一位教導兒童美術的老師「飯糰」（當地對他的暱稱），帶領學生以燒陶創作加以美化。

這個設計過程基本上呼應當地從 1980 年代開始醞釀的對於行人空間的想像。早在 1980 年代初期，臺北市政府委託中原大學的胡寶林教授就社區「遊戲巷」進行規劃與實驗，胡當時就選定了永康街 23 巷進行實驗，除了做巷弄鋪面外，並且訂定一套社區自治管理辦法，包括下午放學時段禁止汽車駛入與停車，以便從汽車的喧囂中還巷於民。胡在回憶自己居住臺北市立師範學院附設小學附近時，提到他的巷子經驗：「我在巷子洗車時認識了對面的師專的老師，孩子

從此可就近學琴。二樓的陳太太常幫忙代繳上門現收的水電費；樓下豆漿店的老闆每次都讓我取水洗車；郵差先生用鄉下的茶葉和我們交換外國郵票。有幾回，我帶著自己的孩子及幾個學生義工在巷口公園和社區裡的兒童畫畫演戲，他們畫得一巷子的彩色粉筆，陽光和笑聲灑了一滿地」（胡寶林 1992:126）。

胡的描述代表了臺北這一部分市區的特殊經驗：約在今天中山南北路以東、新生南路以西、忠孝東路以南與羅斯福路以北的這個區域，日治時期主要為日本人的居住地，其鄰里特色即是密密麻麻的巷道，筆者曾在偶然的機會認識一位奶奶住在青田街（離永康街只有五分鐘腳程）的女性朋友，回憶小時候回到奶奶家的感覺就是能穿梭於像迷宮的小巷子裡。著名的文學批評家李歐梵則認為這正是臺北的文化所在，他認為臺北的多元「不在於高樓或大商場內的貨色，而在於各個社區內——特別是小巷子裡——的人文景觀。譬如永康街附近的那幾條巷子，就是我這個都市漫遊者最喜歡去的地方。……這種社區文化，雖然它小得貌不驚人（和上海的浦東恰好相反），卻隱藏著各種『人脈』和無數的文化回憶」（李歐梵 2003:viii-ix）。

李歐梵歌頌的雖然不見得是一般性的臺北巷弄文化，看過幾米的《向左走，向右走》繪本改編的電影的人都知道，像民生社區的巷道生活（劇中的街道）可能還是疏離的人情居多，不過永康街附近社區的確讓居民產生特殊的都市行走經驗。1995年十二月出版的《永康之友通訊》第四期有一首詩呼應類似的新故鄉之夢，作者黃君綺寫出〈生意盎然的街〉：

如果一串串飛揚的蝶影是夏日阿勃勃的黃花，那麼，巷道中一盞盞蟬鈴便是濃濃綠樹，如果陽光下的天地樸實溫馨，那麼，夜晚的名字就叫做絢爛繁華。循著愛國東路接近太陽升起的地方，我們將預見永康街的支流（十四巷），在信義路與金華街的中間，麗水傍著永康緩緩潺流（瑤公圳已然隱成地下源泉，悄悄沒有聲音），還有遼闊的大安森林作為東方屏障，保衛著、鞏固著永康故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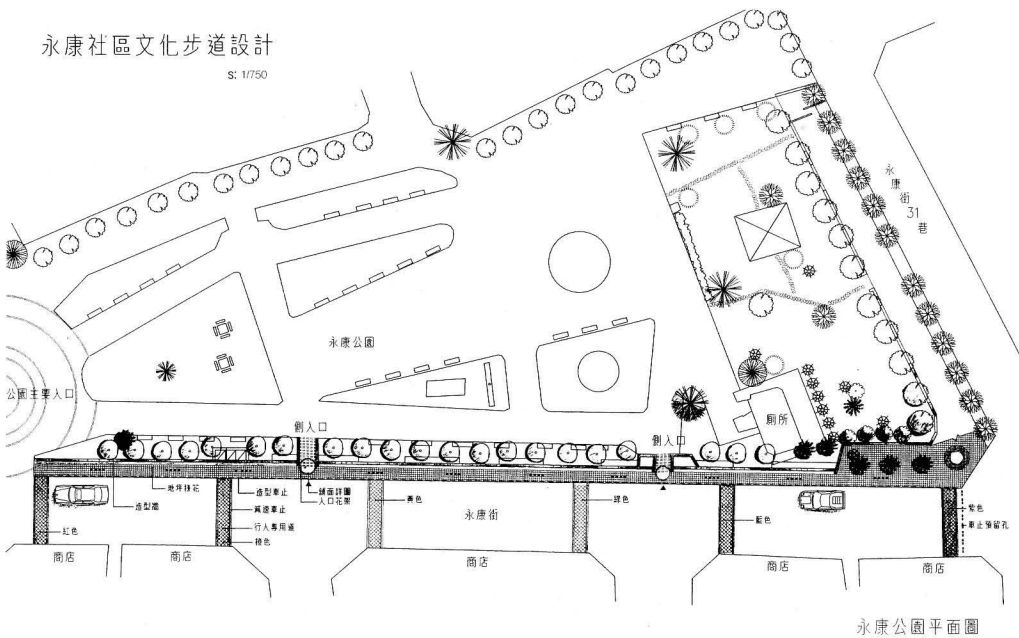
對永康街附近的居民來說，類似的街道想像與回憶不經意地譜出日常生活中的許多旋律。筆者曾邊散步、邊聽領導公園保護運動的陳歆怡提及她的行走經驗，她知道哪戶人家種了哪些花草（因此在哪些季節就會有什麼味道），哪些路旁公寓房子裡又曾發生過哪些感人（或嚇人）的故事。原在街角賣麵的林茂男先生曾回憶起，他父親在1950年代，會在夜裡推著麵攤來這裡做生意，當時還都是

日式平房的社區裡，傳出麻將聲的人家會有人出來叫麵吃，吃完之後就直接把碗筷放在門邊，他父親會在回程時過來收。他還帶著筆者去看當時附近的三輪車伕的聚集處，剛好就是筆者在社區暫時落腳處的一棵榕樹下。

永康協會的步道計畫承續如此的社區想像與回憶，街道構成社區生活很重要的一部分，因此希望新完成的公園可以變成行走過程中一個輕鬆愜意的休息站。他們期待這條沿著公園興建的步道可以讓常隨意違規停在公園外圍的汽機車退位，使得公園更容易親近。筆者手邊有一個步道設計階段時的示意圖（見圖2），幾乎是將上述的行走經驗與期待具體圖像化了：透過車輛減速並禁止進入社區範圍，將街上汽車對行人的威脅降低，公園圍牆外約一公尺的人行道進一步保障行人的通行無阻，行人的視覺與聽覺可以因此解放，欣賞旁邊的綠樹紅花與圍牆的拼貼藝術創作。原本的設計也希望如此從容的行走空間可以搭配周遭的商業活動，將商店和公園合為一體，互蒙其利。

永康社區文化步道設計

S: 1/750



永康公園平面圖

圖2 永康社區文化步道設計圖（永康社區發展協會提供）

只是天不從人願。步道設計過程一開始，就和日益嚴重的社區停車問題產生利益與生活風格的差距。永康協會自從1996年成立以後，其實花了很多時間對付汽車與停車問題。很多人談到臺北的停車問題時，常把臺北比喻成一個超級停車場。事實上臺北的巷道負擔了很大一部分的停車空間，夜裡當人們下班回家，繞行住家街道好幾圈尋找停車位，是很多負擔不起付費停車位的臺北駕

駛人的共同經驗。永康街的巷道停車情形尤其擁擠，幾年之前甚至連轉彎處都不放過。永康協會在 1996 年時曾特別召開社區會議，協調禁止停車的措施，尤其是有關轉彎處加畫紅線。更早之前，胡寶林曾想改造金華街 243 巷成為歐風咖啡區，在巷道兩旁擺放花盆，不過引來車主的強烈抗議。白天住家車子開出，在附近工作的車主換手駛入，巷道依舊擁擠，再加上穿梭之間的车子，的確和行人產生爭道問題。

尤其永康街的商店林立，道路又只有八米寬，再加上臺北特殊的汽車購物方式，購物者喜歡暫停在店門口，然後下車快去快回（類似自助式速食店的「得來速」功能），使得這裡成為兵家必爭之地。這個路面使用方式的差異造成嚴重的歧異，使得步道計畫在公告之初就有人反對。1997 年九月永康協會成員曾參加當地有關停車問題的協調會，當時就有人發言反對公園西側改成步道。永康街的店家們更是不支持興建人行道，因為公園西側本就是紅線區禁止停車，但步道的興建將使得道路兩側連臨時停車都不可能，根據剛剛所提的臺灣特有購物方式，店家們普遍相信這將嚴重影響生意，而且也使得貨物不易裝卸。後來甚至還以訛傳訛成永康街將改成單行道，更使得群情譁然。

不過一直到 1998 年公園落成前，這些反對的聲音都暫時無法動搖永康協會在地方事務的發言位置，因為永康協會一直有輿論的支持——其再造家園的過程儼然成為臺北新故鄉的楷模，從《天下雜誌》的報導可以看出這一個楷模的媒體影響力，⁵ 而且永康協會一直和全市的都市改革力量保持一定程度的聯絡。1998 年三月由 OURs 主導，⁶ 永康協會參與的社區聯盟拜見當時的臺北市長陳水扁，要求市政府積極處理以解決「地區環境改造計畫」有關的六十四件個案的行政協調問題。1998 年之前這一股新興的社會力量積極介入地方事務，1998 年五月的里長選舉甚至推出所謂專業里長連線，並且獲得一定的成果，榕樹里里長就是經由這個連線而當選，這些種種作為的確有助於永康協會在地聲望的建立。記得同年永康公園重建落成的場景，許多人扶老攜幼出來參加盛會，負責重建的永康協會安排了各式展覽，而協會促成的社區媽媽合唱團也首次公開演出，甚至媒體記者們也到場安排了幾場訪談。一時之間，從 1995 年開始的保護公園與社區重建運動似乎已經開花結果。

⁵ 請參閱《天下雜誌》1995 年十一月號。

⁶ 「專業者都市改革組織」（The Organization of Urban Re-s, 簡稱 OURs），乃由一群具有社會關懷傾向的建築、地景，以及其他相關的專業人士所組成的關懷都市社會的組織。

但也因為如此，1999 年之後永康協會勢力迅速衰退的問題，就值得進一步深入探討，這個地方勢力的消長必須從一個全市性的都市文化轉換過程的地方效應來看，這些地方爭議，促使不同勢力與立場的團體或個人力圖回應，從而改變了地方權力版圖。

四、從社區想像到商圈營造

步道爭議之後的一年內，陸續又發生多起影響深遠的事件。而和步道爭議一樣，大部分後來的衝突事件都和街道的使用有關，街道爭奪戰變成永康社區改造過程中一再重複的主題，永康社區的家園之夢牽扯入了益形複雜的社區發展論述，同時將社區捲入了一個全市性的成長機制——商圈營造。這一個新的政治經濟情況也產生了其地方性的細微影響：包括兩里勢力的確立以及社區勢力版圖的複雜化。夏鑄九於 2001 年在當地由「永康里地區發展計畫工作坊」所主辦的一場演講會上，曾以「高級化」來描述這個過程，認為社區將遭受軟性的都市更新（不像鴨霸的推土機）以及房地產仲介業進入的投機炒作的威脅，因而導致居民結構的改變以及公共空間私人化的趨勢（例如社區活動常有的公園擺攤或社區變臉）。不過這個引申自「縉紳化」（gentrification）的概念卻不適合永康街區域的情況，美國都市學者使用這個概念時，指的是原來破敗的區域遭受中產階級先鋒部隊的侵入，逐漸取代了原有較貧困的居民，整個區域因此「縉紳化」（Smith and Williams 1986；Smith 1996）。

街道事件關連著私人利益、公共部門與地方網絡，廣泛地牽涉了里辦公室、社區發展協會、臨時的住家組織與前後屆的市政府機構。接下來筆者將討論一個較為複雜的內外關係，包括新的兩里辦公室之聯合勢力和當地店家主人成立的新的永福協會，以及在這些牽涉到龐大資本的事件過程中，與原有的永康協會所展開的抗衡。

在 1999 年的年底爆發所謂停車塔事件，永康協會出面反對建設公司在永康街 23 巷的一處基地（原遊戲巷）建立高級住宅大樓以及可以容納四十四個車位的停車塔，並以每個車位二百萬元販售。永康協會以停車塔的建造嚴重影響當地的交通為由，動員反對，並獲得停車塔附件住家的響應，永康協會同時根據市政府 1999 年七月頒佈的「臺北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規則附條件允許使用之核准基準表」，第三種住宅區內興建停車塔應辦理「社區參與」，質疑市政府行政怠惰，未召開社區說明會。

過去五年以來，永康街周遭的社區政治繼續圍繞著對街道空間的使用與詮釋權的爭執。都市經濟學家 Jane Jacobs 曾將街道活動視為是社區生活的精髓所在，她認為商業構成街道多元使用的重要元素 (Jacobs 1961)，不過某種經濟因素總誘使許多街道自殺，因為這些經濟因素常毀掉了街道發展必要的多元性。永康街的例子顯現出地方人士如何評估與看待這些經濟因素，例如從停車塔的爭議中，我們見到領導保護公園的永康協會奮力反擊。筆者曾訪問當時的理事長陳煙以及為停車塔爭議熱心動員的創始會員陳欽怡，她們對於社區幾年來的發展問題感到憂心忡忡，尤其擔心資本投入後引起的內在變化，認為近幾年異常熱絡的房地產與店面出租市場，對社區造成不小的衝擊，包括交通、噪音與衛生問題等等，尤其激烈的商業競爭常破壞原有的人際關係。

不過內部的聲音並非完全一致，停車塔爭議基本上延續步道衝突的利益和內部成員意見紛歧的問題，永康協會的家園再造運動，再度遭遇強勁的資本入侵與新地方發展論述的挑戰，進而產生齟齬。永康協會從步道到停車塔問題始終不妥協的態度，引起對手批評，而榕樹里里長福嫂在爭議中被指責暗助建商，不過她也反擊批評永康協會一味反商，反映出領導階層的天真。當然這些互相的攻擊可能都簡單化了對手的方法與目標：榕樹里里長其實是在競選的過程中發現了永康協會人際網絡的限制，以及社區發展複雜的一面，因此當選後，一方面成立一個全女性的鄰長群，以延續永康協會社區媽媽治里的精神，另一方面積極聯繫當地的店家主人們。永康協會其實也不是全然反商，筆者在另一篇文章 (莊雅仲 2005) 曾提到在 1998 年，永康協會曾試圖謀合店家與住家的歧異，建立一個社區導向的商業環境。

發生於同年的另一起街道使用權與家園的保衛戰——捷運聯合開發抗爭事件——卻意外地改變了這權力平衡的局面。也是在 1999 年，永康街口左側信義路的住戶，集結抗議新的捷運信義線聯合開發計畫，由於原計畫的信義線東門站的站體將設在信義路南側一邊，故沿著信義路 (從金山南路到永康街) 的一排住家將依法辦理徵收，當作捷運車站用地，並以聯合開發的方式建造新的商業與住宅大樓，原住戶有優先購買權。不過這歷經兩任市長的既定政策，卻因未和居民溝通而引起反彈，大部分居民因擔心補償費不足以支付再購買的費用，而且捷運工程浩大工期漫長，期間變數不易控制，再加上居民對附近環境的認同，搬遷意願不高，種種原因造成許多住戶出面反對，和市政府交通局展開長期抗爭。後來當上水岸里里長的永哥，即是當時重要的領導人物，曾聯合約四十幾戶的居民，寄發存證信函反對捷運的聯合開發案，並動員到協調會裡抗議。

這起 1999 年的捷運聯合開發案抗爭，最後造成捷運信義線重新變更設計，因為原開發案中的房屋主人們，在當時還是鄰長的永哥（同時也是店主和屋主）的帶領下，獲得整合並寄出存證信函反對聯合開發案，成功保留了原來信義路的街道使用情形。某種程度上，這次屋主的聯合行動代表了一次房屋價值的保衛戰，許多屋主與房東們都熱心參與。不過據當地人告訴筆者，也有許多人聽聞拆除風聲時早已經趁機將房屋轉手，所以這個保衛戰實際上也是一個信心投票。觀察後來永康街區域的發展，這個保衛戰的戰果當然豐碩，一方面保住家園，一方面也維持了土地持續上漲的態勢。同時，許多參與的屋主（多是男性）在永哥的帶領下成爲一股新的社區力量，開始積極介入社區事務。

從永哥的崛起，我們看到一個社區人事消長的過程，這或許是世紀之交本地最大的事件之一。這股新興的力量加入新的永福協會，因此兩里的行政與商業力量得以暫時統一。2000 年新的永福協會取得市政府建設局商業司負責的新的商店街輔導計畫的補助經費，市政府計劃以三年時間，補助約三百萬元的經費，這在當時算是永福協會的重大成就之一。

這一個計畫的開始可以看成是新舊協會權力明顯消長的濫觴，新的商店街計畫看來足以比擬五年前的公園重建運動，只是當時的「社區」新故鄉之夢已讓位給「商圈」所營造的國際都市打造願景，市政府有關這個計畫的網頁如此地敘述：

臺北市政府鑑於臺北市商業發展過程中，具特色之商店街，如水岸里榕樹里社區商店街區等，因未能有效規劃及缺乏共同經營理念，致面臨發展瓶頸，甚至會因競爭力漸失而趨沒落，因此，北市商管處提出商店街區輔導計畫，即是希望藉計畫之執行，提昇商圈整體形象及凝聚商圈業者集體合作意識，以重塑傳統商店街之新風貌，帶動具特色商店街區之復甦，以迎接並充分運用自九十年代起實施之週休二日制，為具特色商店街區經營發展帶來消費性、服務性、休閒性三者兼具的新契（商）機。以『水岸里榕樹里商店街區』既存的商店與社區特色——美食、古玩、休閒，是具備發展成為與香港『蘭桂坊』、新加坡『克拉碼頭』、吉隆坡『孟沙夜生活圈』齊名的『水岸里榕樹里藝術休閒美食街區』的條件。

這個商店街的輔導計畫打算分別在軟硬體上改善永康街與麗水街的商業經

營與空間意象，由管理科學學會負責承辦相關的訓練課程與居民溝通業務。這個計畫牽涉臺北市兩條貫穿永康社區的著名街道：永康街和麗水街，兩條街道相隔還不到五十公尺，近來發展出非常特別的街道意象與氣氛。過去約十五年的時間，這兩條街分別從原本地方型的民生用品零售與飲食業蛻變成各具特色的飲食文化與精品古董業的聚集地。

商店街計畫呼應 1990 年代末期就已開始的地方空間商品化的趨勢，因為新都市文化漸增的商機已引起店主與房東的注意。在進駐的店主們的巧思下，創造出一個個令人驚艷的都市意象，筆者曾訪問附近一家咖啡廳的空間設計者，他就特別著重打破店與街的內外之分，並擅用植物的調溫效果，創造出當時還頗新奇的戶外咖啡廳效果。也有許多個人的創意奮鬥史，比如全臺灣的芒果冰熱，就起源於此地的「冰館」；鼎泰豐創造的小籠包傳奇，仍然在日本人的捧場下繼續流傳；街角炒義大利麵的師父其實是交響樂團的大提琴手；以及走遍世界尋求不同的咖哩風味，最後落腳此地的老夫婦。

相對於形形色色的新都市消費文化，高昂的租金則帶來一定程度的危機。的確當地也盛傳舊店面遭房東收回，轉租給連鎖商店，以收取較高租金的事情，房租價格因此蠢蠢欲動。即使連鎖商店都無法自外於一波波房價哄抬的過程，像惟客爾麵包店就還是拼不過屈臣氏，導致當地居民在購買麵包上的不便（在這個人口約有一萬人的社區中，只有這一家麵包店）。原來的社區小店的危機感就更大了，因為越來越難在微薄的利潤和高漲的租金之間維持起碼的收支平衡：店面是自己的店主倒不如將店收起來，然後再將店面轉租出去，自己當房東，因為租金可能還高於辛苦終日賺取的利潤；店面不是自己的店主就得另謀出路來抗拒資金的飆漲，那些可以加碼投資更新店面的，也許還可以放手一搏（見圖 3），無此財力者則就必須面臨遷離的命運。

當然並非每個當事者都如此樂於接受這個房租的戰國時代，像永康協會就趨向採取堅壁清野的方式。除了這樣的抗拒態度之外，某種「第三選擇」的聲音也正在形成之中，家裡也有店面出租的邱老師，就特別告訴筆者說他不願隨意哄抬房價，並和他太太在附近開了一家小咖啡店，店名就叫「五餅二魚」，刻意引用聖經裡的一則共享食物的故事，⁷ 做為他所謂的社區生意的典範。也有很

7 耶穌傳道時，一位信徒帶了五塊餅與二條魚，傳道告一段落，大家饑腸轆轆，卻沒有人帶吃的東西，這一位信徒貢獻出預先準備的食物，「耶穌拿起那五個餅和那兩條魚來，舉目向天，祝福了，把餅擘開，遞給門徒，叫他們擺在眾人面前，把兩條魚也分給眾人，眾人吃了，也都吃飽了」（出自《聖經·約翰福音 6》，頁 1-15）。

多房東聲明不會跟著仲介公司的哄抬路線走，認為店面出租總還是要有點義氣，也必須考慮社區生活的要求。

類似這樣的聲音代表著地方對於資本的回應。在筆者的研究中，曾有人提過較大的街道改造計畫，比如臺中精明一街的成功案例——某種店主和住戶之間的合作方案，就被當地某些



圖 3 永康街的創意小店（莊雅仲攝影）

店主當作模範，不過因為內部互信基礎薄弱，終究無法形成共識，並付諸實現。但社區裡的一條小巷（在當地稱為 243 巷），的確在公園重建落成前後的幾年間，慢慢形成一個特別的空間意象，以及巷底的輕鬆氣氛（見圖 4）。附近的住戶基本上也歡迎這個改變，筆者曾遇到一些帶著小孩的年輕媽媽，會像一個藝評家一樣對於這裡意象的改變品頭論足。類似的地方商圈營造過程，某種程度上為一個新的社區集體力量之形成提供了環境，下一節我們將探討在這個新文化之下，一個經過重整的人群組合。

五、雙街記

本節將處理新里政的動員模式，討論這個新的動員模式可以進一步深入瞭解這個重整後之力量的社會基礎、文化元素與空間安排的互動過程：即彼此互相激盪與支援。注意這些日常實踐可以讓我們更具體地知道新商圈營造所產生的地方效應，而這些效應則進一步影響地方網絡與衍生的新權力。

在永康社區，一個令人意想不到的發展是，商店街計畫實施的過程很快地讓組織陷入新一輪的紛爭之中。首先是永福協會內部因為經費補助的優先性產生爭議。當時擔任監事的永哥質疑其他的成員忽略麗水街（在水岸里境內）的



圖 4 公園附近小巷的輕鬆氣氛（莊雅仲攝影）

改善問題，比如竟然將麗水街的優先性排在金華街 243 巷（在榕樹里境內）之後（參考圖 1），因此懷疑水岸里遭受榕樹里人士不當的排擠。這個不平之鳴更造成後來水岸里和榕樹里行政勢力的嚴重衝突，永哥（當時還是鄰長，不過深受老里長倚重）和榕樹里里長之間陷入長期的消耗戰中，中間還夾雜了永福協會的店主勢力。衝突的過程中，雖然永康街介於水岸里與榕樹里之間，不過因為榕樹里里長在 1998 年當選後，就積極經營地方，因此比較擁有主導權；而當時還是鄰長的現任水岸里里長永哥，在爭執發生後，開始部署並發展自己的影響力，由於麗水街就在水岸里境內，因此成為其表現的重要舞臺。一直到商店街計畫在 2003 年底結束前，這些爭議還未能獲得妥善解決。在三年過程中，大大小小的衝突不斷，嚴重切割社區的人際網絡，也同時阻礙了組織之間的合作。

不過這些衝突也刺激各方勢力積極尋找不同的動員方式。榕樹里里長全女性的鄰長系統受到媒體的注意，並且和永福協會合作成立巡守隊，更進一步在 2002 年暑假推出少年單車巡守隊，對外給人氣象一新的專任里長的觀感。而自從 1999 年起，榕樹里每年在公園舉辦中元普渡拜拜，到 2003 年時，這個公園聯合普渡拜拜儼然已成為「創造的傳統」。水岸里亦不甘示弱，雖然遲了些，但也努力地建立自己的社區規劃專業與巡守隊，積極派人參與市政府主辦的社區規劃師培訓，並且和原來的永康協會合作舉辦社區工作坊。在 2002 年，水岸里

成功地爭取到市政府答應改善與美化金華國小周遭的人行步道空間，以及整修靠麗水街一邊的校園圍牆。

這一節將從巡守隊的運作過程來看這個新里政。新勢力的興起伴隨一個重要的地方組織發展：2001 至 2002 年間兩里相繼成立巡守隊。巡守隊的成立起源於社區治安的惡化，雖然統計數字並沒有太大的起伏，不過臺北人對治安的疑慮日深，表現在不時發生的縱火案和層出不窮的竊盜與闖空門案件。1997 年白曉燕事件以後，許多社團曾發起社區治安會議，後來各個社區也成立許多社區愛心站，提供學童課後暫時的避風港。2000 年後各里相繼成立的巡守隊基本上承續這個潮流，希望透過更有組織的地方互助體系，以提供一個即時性的治安通報系統。

這個在地的治安自發性組織，代表某種行政力量對社區街道與巷弄的再確認，套用 Benedict Anderson (1983) 有關朝聖的說法，這和一個想像社區感的形成有關。只是和國土巡禮所觸動的民族認同感不同的是，都市社區認同所面對要處理的是有限空間中的密集與異質性 (Wirth 2002[1938])。都市社區雖然名為社區，不過卻和十九世紀社會學家 Tönnies (2002[1957]) 筆下面對面的人際關係不一樣，都市疏離使得近在咫尺的「鄰居」們，卻可能老死不相往來或相見。巡守隊的巡守功能因此在確認疆界，並透過每日的回報系統建立共同命運感，同時里辦公室也配合不定時在佈告欄與各公寓門口張貼里政通訊，有效地傳遞並建立同時、共存以及連帶的感覺，也就是 Benedict Anderson 所說的共時感 (simultaneity-across-time) (Anderson 1983:24-25)。

巡守隊雖有助於建立社區的命運共同感，但弔詭地是，巡守隊成立的治安考量卻可能代表社區居住空間在形式的分化。近幾年永康社區裡接連完工或起造好幾棟新的豪華大樓，周邊圍起了高牆，裝上了監視器，大門則有保全人員看守。相對於這些擁有守衛的新建大樓社區 (gated communities)，舊的四或五層樓公寓顯得防護單薄，有些舊公寓可能連一樓大門都沒有。筆者後來發現參與巡守組織的志願里民，大都是舊式公寓的居民或是店家老闆，亦即是最有可能受到犯罪威脅的兩類社區使用者。

在實際的運作上，巡守隊曖昧的定位，使得類似組織的成立與發展夾雜著複雜的地方政治問題，一方面結合但也切割了人群。基本上巡守隊屬於地方自發性的組織，不直接隸屬於警察單位——雖然內政部曾頒佈了相關的獎勵規定；巡守隊也不屬於里辦公室的行政事務，雖然很多巡守隊的籌備是由里長主導。根據籌設的規定，巡守隊必須由社區發展協會發起，不過不像社區發展協會是向

市政府登記有案的社團，有相關的社團法人的法律規範，巡守隊並沒有類似的法律與行政地位。

在永康社區，一開始巡守隊的成立與其說是社區治安的需要，不如說是政治需求。永福協會成立之初，積極爭取各項成績，不過市政府的評比結果卻不盡理想，詢問的結果才知道是因為沒有社區巡守組織。雖然有這一段插曲，不過永福協會倒是如火如荼地協助成立榕樹里的巡守隊，很多主要的幹部都投入巡守隊的籌備與日常工作，第二年又協助成立水岸里的社區巡守隊。雖然大部分的人謙稱巡守隊只有象徵性的嚇阻力，不過一些人倒是嚴肅看待他們的工作。在筆者跟隨著巡守的日子裡，從隊員那邊瞭解到哪些社區死角需要特別注意，哪些地方宵小可能攀爬而上，哪幾棟公寓常忘了關大門，哪些地方路燈該亮未亮。而最令筆者覺得不可思議的是，聽一個隊員說，如果某戶門口有特殊記號，就得知住家注意，這聽起來像是阿里巴巴故事的現代版。

在 2001 至 2003 年的三年間，巡守隊取代了社區發展協會，成為重要且密集的人際交往場域，兩個里加起來，總共大約有一百五十人相繼參與社區巡守的工作，這對社區型團體來說，算是參與踴躍。前述已經說過原來永康協會的勢力已經衰退，後來的理事長告訴筆者說，永康協會現在比較像是工作室，代表著會員制度的式微；而新成立的永福協會則比較像是店家老闆的俱樂部組織，在招募會員方面有其先天的限制。巡守隊適時的興起，提供一個新的人際交往管道，而且和原有的永康協會不同的是，巡守隊是在里長的鼎力協助下成立與發展，因此其內部的關係充滿著領導與跟隨的動態平衡，以及隊員之間同袍感的火花。

這個差異如果和先前永康協會的運作比較，則更為顯著。筆者在前面說過永康協會的興起代表 1990 年代的理想主義，這個理想主義表現出一種形式的平衡美學，具體化在永康協會的運作過程中。永康協會被塑造某種想像下的公共論壇，強調人人皆有權利發聲與行動，理事會的開會基本上是圓桌會議的形式，並沒有明顯的領導角色出現，而且討論的內容也大多是公共議題。有次筆者和榕樹里社區巡守隊巡守街道時，一位隊員說，他覺得當初在永康協會裡的關係實在太「相敬如冰」，現在榕樹里的里鄰長們與巡守隊員間的合夥關係則自然、親切多了。這個比較透露出巡守隊成員之間不一樣的交往方式，由於巡守隊的任務單純，因此並沒有太多的討論事項，但每天完成任務的共事感覺，則讓隊員之間容易產生同袍之感。

類似同袍感的出現歸功於許多事項的配合，首先是兩里的巡守隊都設法擁

有他們的聚會所。當初永康協會也有辦公室，但除了開會外，進出的人很少，永康協會曾想過開闢喝茶空間，不過總是無法凝聚人氣。巡守隊的聚會處則不一樣，榕樹里在里長的大力爭取下，取得一處約三十坪大的地下室空間，而且就在永康街口不遠的熱鬧地方，巡守隊的總部就設於此，除了辦公室與會議空間外，並附設有乒乓球桌與卡拉 OK 設備，而且因為任務需要，巡守隊總部每天晚上總是人來人往，幹部或者純粹想找人聊天的隊員因此也會常來走動，隨地一坐就是一晚的天南地北，結束也許再有另一小批人「續攤」宵夜小酌一番。

水岸里的巡守隊聚會處則由當時還是鄰長的永哥提供。永哥任大隊長，由於住在巷內一樓，住家因此有一個小院子，這成為水岸里巡守隊成長發展的最主要原因。永哥將其設置成一個泡茶聊天處，隨時敞開大門歡迎大家進來坐，使得巷道與院子間的現實與想像的藩籬消失，曾有一段時間，幾乎二十四小時供應熱水茶葉，成為隊員間的最佳去處。這對永康社區的都市住民來說，是一個新奇的經驗，相對於常大門深鎖的都市住宅，尋人得經過層層詢問的疏離經驗，永哥家位在巷道邊的泡茶處成為一個輕鬆的社會互動空間，行人過往常探頭看看是不是有人在擺龍門陣，倏地一下找到一個好位子坐下來，也許有人遞上一杯熱騰騰的烏龍茶，然後再點上一根煙，就是一下午的消磨。

執行巡守任務的過程也是另一個社交戲碼，榕樹里巡守隊刻意將住在附近的人安排在同一個任務，因此每天巡守的過程也是鄰居相互認識的過程。這樣子的安排使得榕樹里巡守隊員會特別注意居家附近的細小變化，比如地上的小坑洞等等，而且同一任務的隊員間也容易建立長期的關係，間接促成居家附近守望相助的精神。水岸里的巡守採任意編組，但巡守的任務常轉成一場場串門子大會。從金華國小旁的消防局出發後，首先會先繞行靠金山南路段的一排早期公寓住宅，這一部分的住家與商店較少有人參與巡守隊，因此巡守的過程比較單純，隊員會很仔細地檢查昏暗的後巷，用手電筒東照西照一下。巡完這一部分住家區域，緊接著會穿過里中間多是公共建築的一片區域。當回到靠近永康街西側的住宅與店舖時，隊員的行動就開始熱鬧了起來，有時會從牆外呼叫同是隊員的居民，這些不執行任務的成員有時會開門站在門口閒聊幾句，熱心一點的甚至還會邀請一夥人入門喝茶，某些隊員開的小店更是成為必經的中間休息站。曾有好幾次的巡邏，筆者都和大夥停在那間名叫「五餅二魚」的小咖啡店裡，喝冰茶、吃小菜加聊天，然後結束一晚的巡行。

巡守隊的發展得歸功於兩個里的里長與永福協會重要幹部的積極經營，永哥與福嫂都具有某種魅力。福嫂在參與永康協會的時候，就顯現出召集人群的

能力，福嫂雖然不是常務理事，不過卻在理事會中具有一定的影響力，一方面福嫂的家庭有政治參與的歷史，和當時的反對勢力有一定的關係，這使得原來永康協會中一些相同立場的人和她維持較緊密的關係，其中甚至有人就是在參加反對運動的過程中認識，因而變成朋友，這些人在永康協會中形成一個堅固的小團體。不過這個小團體並不是排斥性的，基本上當時永康協會內部很多人支持福嫂出來競選里長，不論立場是否一致，大家都很盡力輔選，幫忙發傳單以及介紹朋友相挺。筆者記得在競選里長之前，一些理事曾聚在福嫂家，大家都顯現出願意幫忙的熱情，福嫂因家庭的因素仍有些猶豫，當時的總幹事還因此急得落淚。

福嫂當選里長後，一部分永康協會的人因前面所討論的衝突，慢慢和福嫂疏遠。當筆者在2002年回到社區時，很多當初認識的媽媽們在提到這一連串分裂過程時，還很難釋懷為何情勢會急轉直下。有些人談到原來內部就已存在的爭執與人情之間的糾葛，比如選理事長時的尷尬情況——耳語相傳中的兩個女人的戰爭；有些人則不敢相信為何原來合作的基礎竟然如此薄弱，當初里長選舉時，很多媽媽還都挨家挨戶幫忙拉票。不過仍然有一部分的媽媽加入榕樹里的鄰長媽媽群，福嫂的領導雖然備受爭議，但其內部的凝聚力卻很強，而且很有組織。筆者曾參與過榕樹里的里鄰長會議，福嫂臨時有事不能來，十幾位鄰長還是很有秩序地將待辦事項處理完畢，議事效率並不因福嫂的不在場而有所降低，福嫂原來的小團體成員成為她最好的代理人，會主動地扮演執行者與辯護者的角色。

自當選里長後，福嫂致力於建立不同層面的接觸。前面已經提到，選後她就意識到社區裡有許多聲音，原來永康協會的主張可能無法照單全收，也因為如此，福嫂開始接觸不同的地方力量，包括店家的組織等等（永福協會就是由店家主人所組成的）。而某個程度上，巡守隊的成立則是將原本分屬里政的媽媽群和店家組織的店主人們加以整合。記得一年夏天，福嫂為了感謝大家的幫忙，在社區的一家餐廳設宴請客，筆者剛好也應邀在場，福嫂和其先生熱情地招呼大家，一席開場白講得大家心頭酥軟，大部分擔任巡守隊幹部的店家主人們天南地北地暢快飲酒，大談這幾年的豐功偉業，媽媽鄰長們也不甘示弱，憑著人多勢眾以及良好的默契，更加炒熱會場的氣氛。

相對於福嫂的手腕、身段與背景，永哥靠的是個人的勤奮、觀察入微的識人能力以及一點點的魄力。永哥原本只是一個做小生意的店老闆，多了一些社會經驗，但沒有像福嫂一樣的家族奧援，只因捷運聯合開發的抗爭事件而投入

社區事務，永哥勤奮地擔負起抗爭的整合與連絡工作，加上原本住在他樓上的一位先生是一個足智多謀的軍師型人物，使永哥得以成功地領導眾人並阻止了開發案。這讓永哥的社區聲望水漲船高，許多住在信義路這一排原本將面臨樓房拆除命運的住戶們，很快成為永哥的死忠兼換帖。這些住戶也是聚在永哥的院子茶坊的常客，永哥長於「按捺」來訪的不同客人，因此茶坊裡聚的是三教九流，各懷絕技，除了剛剛提到的諸葛軍師外，還有曾經幫老蔣做西裝的老裁縫師、1970年代奉派出國的退休工程師，以及身殘心不殘且熱心公益的炸油條阿山。

也正因為如此，水岸里巡守隊成為一些「人物」嶄露頭角的場所，街頭川菜館的老王（假名），街角開影印店的小德（假名），各因其不同的性格逐漸擁有領導一方的架勢，除了里長茶坊與巡守時的串門子外，小德也慢慢召集了一群巡守隊成員，開始互相輪流邀請到家裡作客，大多是店裡打烊後，大家聚聚、小喝一杯，到附近買些滷味回來配菜下酒，然後就東扯西扯地相互抬槓。筆者最喜歡聽住在里長隔壁樓上的老許（假名）和當老師的小邱的太太彼此各執一詞地鬥嘴抬槓，就好像日常相聲般的精采。還有一次在某家裡烤肉，旁邊小孩子在打乒乓球，小德很逗趣地和小孩子玩在一起，展現了他特有的親合力。雖然小德不多言，不過他獨特的實事求是的做事態度與沒有架子的親切感，使得一個新組合的人群就這麼天南地北的交往（談）下去。

雖然巡守隊的成立與發展，鞏固了某種人群連帶，不過由於巡守隊基本上以里為單位，卻因此更加劇了原來兩里的衝突。在兩里的較量與競爭中，巡守隊成為主要的策略總部，這個競爭狀態尤其在2003年初的里長選舉中達到高潮：永哥出來競選里長，榕樹里的許多人卻支持水岸里的另外一位候選人，因此展開激烈的攻防。這一位挑戰的候選人雖有外援，但是永哥透過巡守隊的網絡，某種程度奠定了基本的支持人群，同時這些支持群眾幾乎都是熱情的參與者，因此也充分發揮了拉抬的效果，再加上永哥原本勤於一點一滴耕耘的基礎，選舉結果永哥大獲全勝，還創下了歷年最高的得票率。筆者還記得開票完後，永哥家前面的鞭炮放得噼哩啪拉地響，賀客盈門，那個晚上永哥臉上的笑容就這麼掛著。

六、流言的美學

截至目前我們討論了權力在日常生活中的形成、部署與運作：筆者從一個

全市的經濟變遷狀況談起，觸及社區空間商品化過程中，不同人群與組織的聚合與回應，這些描述基本上是希望定位出一張權力地圖，以認識權力的創造性 (Arens and Karp 1989)。接下來的分析中將更進一步深入這個權力地圖的夾縫中，瞭解某些殘存且無以名之的片段論述，或更直接地說就是常常不知出處也無以追蹤其路徑的流言。注意流言的生成、傳播與接受，某種程度告訴我們權力運作的流動與穿透性，同時告訴我們組織的限制以及領導的負擔。James Scott 視流言為弱者的武器，是弱勢者無力公開攻擊時的另類抗議管道 (Scott 1990)，Achille Mbembé (2001) 則提醒我們注意玩笑 (humor) 在後殖民國家的政治反抗效果。

不過在本文的案例，流言面對的並非是階級敵人或是殖民權力，而是地方不同勢力夾縫中殘餘力道的遭遇，像是尖銳的兩面刃暗器，爭議的各方暗地裡拋出，既不知來源，也無從得知其傳遞路徑，不過其影響力卻驚人，尤其是對領導權造成的傷害。流言特殊的敘述形式，事實與虛假並存，以及快速的變異增生特性，導致流言創造的半匿名與集體性，流言的接收當下也即是創作的時候，然而傳播者述而不作的宣稱，卻總讓它指向另一個場景。在筆者的詢問與訪談中，很多人會試著告訴筆者他們知道的事件過程，很多人會轉述他人的話，或者引導筆者去和某些人談話，認為可以因此發掘某些事情的原委。筆者便常這樣周旋於好幾個網絡圈中，有時回到原點，有時又在重疊的地方叉出，當感覺柳暗花明之際，卻隨即又在相關人士的小心應對中陷入困頓，無從瞭解事情的真相。

類似接收與追蹤過程的迷離，使得流言快速但隱晦地流轉於人群之間，這使得這些流轉的話語成為組織之外的另一個戰場。1998 至 1999 年之間，自里長選舉到發生人行步道爭議時，流言擊碎了永康協會過去三年所投射的平衡寧靜的圖像，相對於媒體呈現出的草根民主的象徵，永康協會被形容成剛愎自用的小團體。當筆者再度回到社區時，有人跟筆者提及永康協會在公園重建過程中不顧大家意見，任由一小群人專斷行事，即使在那幾年期間，永康協會曾進行過多次的民眾參與設計；也有人批評公園設計與施工過程，永康協會進行過多不專業的干預，並故意排除里長與區公所的介入，刻意搶功；更有人提到公園西側牆面委託臺北師院師生設計施工，永康協會卻在施工過程中不聞不問。

雖然也許有人認為流言只是沒有根據的中傷，牙根一咬就過去了，但類似的小道耳語其實嚴重傷害了組織的運作。許多當初協助筆者田野工作的社區媽媽們，因為不同的理由參與永康協會的組織工作，大半皆屬於義務幫忙性質，卻

常常無端捲入耳語之中。當人行步道事件衝突日熾，流言甚至傳出了經費運用有問題，指控步道的興建只是為了消化預算等等，這些蜚言蜚語更是讓永康協會的工作人員灰心。筆者後來和一些社區媽媽交談時，可以感覺到大部分的人開始對組織工作失望，即使事件過後二、三年，大部分的當事人都不願再擔任正式的社區工作職務。

類似的心灰意冷說明了流言具有的殺傷效果常大於組織工作辛勞的消磨，流言使得組織工作變得草木皆兵，佔據了當事者大部分的心思，而且由於流言打了就跑的特性，使得澄清與辯護工作變得不是不可能，就是很困難，組織工作的領導者因此常常成爲這個內在耗損的犧牲者。發生人行步道爭議前後，適逢永康協會新舊任理事長交接之時，由於推選過程的一些風風雨雨，造成大家認爲新任理事長和新任里長之間有瑜亮情結，這使得接下來的爭議，比如停車塔事件，被說成所謂「兩個女人的戰爭」，爭議雙方分別得承受一些私底下的質疑，尤其是有關私人操守的質疑。這一方面減損了兩個組織的領導力量，在某個程度上，流言也改變了權力的配置與運作，因爲領導者在這個過程中不是必須改變作風(大半因此變得比較低調)，要不然就是得耗費很大的精神與資源替自己辯護，建立自己的親信團體，但也因此妨礙了自己在另外一些人心中的公信力。

權力節制也發生在永福協會的設立與運作上。剛剛說過新的永福協會基本上是店家的俱樂部組織，雖然具有一定的整合店主人意見的功能，不過也因此很難和商業利益脫離關係，再加上永福協會的理事長其實是一房地產仲介業者，因此一直有人質疑仲介業者和店家以及住家的關係其實有很大的矛盾，流言也開始傳出這位理事長刻意炒作房地產的不當行爲，比如聯合某些房東哄抬房租，造成許多自營的店主無法繼續承租，以便趁機引進連鎖商店。某些心感不平或者心念不一樣、有不同社區發展策略的房東，會因此進行某種小武器似的抗議(Scott 1990)，故意不將房地產或店面的租賃生意交給這家仲介公司。

前面提到兩里(街)政治複雜化了這個流言之戰，以永康街交界的水岸里與榕樹里，里辦公室與巡守隊的聚會處成爲相互攻防的策略總部，使得小道消息充斥。小道消息不斷流出有關兩里領導者的閒言閒語，包括辦活動時圖利廠商，或者有關個人在領導風格上的瑕疵與不堪。筆者在前節所描述的領導魅力，對很多其他人來說卻可能變成是做作、應付、矯情或「見人說人話」，流言因此也就圍繞著這些個人特質打轉。流言也掩蓋正式的公共討論，比如公園辦活動所牽涉到的公私利益的問題，對很多人來說，這個問題其實應該透過社區討論

來釐清，不過相關當事人卻可能在避嫌的情況下（因為常會傳出收受金錢的流言），使得相關議題的公共討論無從進行。

除了互相攻擊外，兩里各自存在的內部競爭關係使得小道消息的流傳更加迷離與尷尬，這也使得內在質疑與挑戰成爲每個領導者的沉重負擔。比如里長常得「隨時」接受里民的拜訪與請託，幾乎到了二十四小時全天候服務的程度，不過一旦里長想稍微改變這個便利商店式的工作方式，內部的聲音就會出現，認爲里長投票過後就想過河拆橋，因此造成內部的不滿與支持者的出走。或者，里長辦公室有時會和巡守隊之間產生無法配合的情況，里長有時會想安排自己相信的人出任幹部，比較敏感的舊幹部就會開始認爲里長想在杯酒間釋兵權。這些齟齬常導致新一輪的組織轉化，不是舊幹部完全退守，就是里辦公室與巡守隊之間的分裂，或者新的領導人物的出現，重新開闢新的組織舞臺。

七、結 論

臺灣在 1980 年代末期到 1990 年代初期，地方文史工作成爲一股新的潮流，我們看到一些具有「歷史」的地方的居民開始尋找自己的在地過去，希望可以在解除政治高壓以及現代化的破壞後，提供一個安身立命之處 (Lu 2002)。1990 年代臺灣逐漸走出戒嚴體制，「地方」成爲一個熱門但有爭議的字眼。到了該年代末期，這一股地方追尋的浪潮逐漸擴展至一般性的地方發展問題，社區成爲這個發展問題的代名詞，尤其在國家力量積極介入操作後，所謂社區總體營造更成爲政治正確的新詞與新政策制定的意識形態基礎。

本文的撰寫某種程度在反省這個新的「地方」熱潮，筆者希望以都市社區爲例，討論這個地方想像與建構的影響與回應。筆者某種程度相信 Hardt 和 Negri (2000:44-46) 或 Bauman (2001) 所說的社區的出現在面對最近的全球資本主義衍生出來的問題，不過不接受他們僅將社區運動視爲某種「原生主義」或「不可能的追尋」。本研究則思索一個較有可能性的圖像，希望爲這十年來臺灣的地方熱潮提供一個反思點，所謂社區到底是什麼？社區運動又代表什麼樣的心靈探索與組織行動？本文對這兩個問題的經驗研究提供理解地方特殊性的基礎工作，幫助瞭解社區運動如何和全市性的問題相結合，因而可以面對某些跨地域性的問題，進而成爲一股舉足輕重的社會集體力量。

筆者的研究試著將社區視爲一個力量匯聚的交叉空間，一方面也希望深入瞭解消費形態改變的地方效應，不過這些效應必須被放在一個權力／論述建構

的在地過程來看，地方（或者地方的未來）因此是這個政治過程的結果。這樣的結果提供地方研究應有的小心態度，尤其是對開始注意地方與文化概念之間複雜關係的人類學家而言（Gupta and Ferguson 1997）。

換句話說，地方不只是新的全球資本主義宣稱與消費的對象而已，地方還是內外在不同力量的總合，這些力量可能來自於不同個人的創意或掙扎，或不同團體的策略或行動。許多學者已談到類似地方的複雜性與可能性，批判地理學家 Doreen Massey 就提到在不均衡發展與時空壓縮的全球化狀況中，還是有某種進步與批判之地方概念存在的可能，只要我們不要將地方視為是邊界穩固的靜態概念或只有一個單一的認同，而是「許多關係在某種特定脈絡下的交互作用的結果」（Massey 1994:5）。討論某種地方為基礎的想像，歷史學家 Arif Dirlik 更要我們注意這個特定關係的不對等力道：例如為了要捍衛地方，就得刻意去搜尋「地方內在所包含的那些東西，某種對日常生活的行為與組織的掌握」；換言之，就是具體的在地過程中的政治計畫與實踐（Dirlik 2001:22-23）。

對許多熱衷社區運動的組織者來說，本文提供的案例並非那麼絕對地正面。本文試圖以永康社區為例，談論不同力量具體化的實踐過程，這裡牽涉到的是都市中產階級的理想主義，一個夢幻家園的想像與實踐，不過本文的研究結果指出這個築夢過程牽涉到的地方政治問題與都市政治經濟狀況的轉變，權力如何在這個過程形成、部署、轉進與受挫，遺留痕跡於都市空間、人心認知與群體組織。

但本文也絕非要訴說一個必然失敗的故事。相反地，本文要說的是個人與組織的某種能動性以及結構的權力之間的辯證關係，這個辯證關係反映在不同的事件與社區爭議中，如同李松根在反省社區營造問題時提到的，社會力的培養與發展「必須要回到實際社會問題的處理，以及操作實例上來驗證」（2002:88）。對 Massey 來說，這個辯證（介於某種動態與基礎、普同與特殊、歷史與空間之間）保證了地方的活力。正是這個日常生活的活力，使得社區有可能成為對抗最近方興未艾的全球化慾望的有效抗衡基地。

參考書目

王金壽

2004 瓦解中的地方派系：以屏東為例。臺灣社會學 7:177-207。

- 李松根
2002 社區營造與社會發展：社會發展的文明進程視野。臺北：問津堂出版社。
- 李歐梵
2003 城市奏鳴曲。臺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 胡寶林
1992 失巷的文明。臺北：業強出版社。
- 陳東升
1995 金權城市：地方派系、財團與臺北都會發展的社會學分析。臺北：巨流圖書公司。
- 莊雅仲
2005 五餅二魚：社區運動與都市生活。社會學研究 116:176-197。
- 黃君綺
1995 生意盎然的街。永康之友通訊 4:2-3。
- Anderson, Benedict
1983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 Verso.
- Arens, W., and Ivan Karp, eds.
1989 *Creativity of Power: Cosmology and Action in African Societies*. Washington: Smithsonian Institute Press.
- Bailey, Frederick G.
1969 *Stratagems and Spoils: A Social Anthropology of Politics*. Oxford: Blackwell.
- Baudrillard, Jean
1981 *For a Critique of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Sign*. St. Louis, MO: Telos Press.
- Bauman, Zygmunt
2001 *Community: Seeking Safety in an Insecure World*. Cambridge: Polity.
- Castells, Manuel
1983 *The City and the Grassroots: A Cross-Cultural Theory of Urban Social Movement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Cheater, Angela
1999 Power in the Postmodern Era. *In* *The Anthropology of Power: Empowerment and Disempowerment in Changing Structures*. Angela Cheater, ed. Pp. 1-12. London: Routledge.
- Cohen, Abner
1969 *Custom and Politics in Urban Africa: A Study of Hausa Migrants in Yoruba Town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Dahl, Robert A.
1961 *Who Governs? Democracy and Power in an American City*.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 Dirlik, Arif
2001 Place-Based Imagination: Globalism and the Politics of Place. *In* *Places and Politics in an Age of Globalization*. Roxann Prazniak and Arif Dirlik,

eds. Pp. 15-51.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Foucault, Michel

1980 *Power/Knowledge: Selected Interviews & Other Writings 1972-1977*.
Colin Gordon, ed.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Gledhill, John

2000[1994] *Power and Its Disguises: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Second Edition. London: Pluto Press.

Gluckman, Max

1956 *Custom and Conflict in Africa*. Oxford: Blackwell.

Gupta, Akhil, and James Ferguson, eds.

1997 *Culture, Power, Place: Explorations in Critical Anthropology*.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Hardt, Michael, and Antonio Negri

2000 *Empir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Harvey, David

1985a *The Urbanization of Capital: Studies in the History and Theory of
Capitalist Urbanization*. Baltimor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5b *Consciousness and the Urban Experience: Studies in the History and
Theory of Capitalist Urbanization*. Baltimor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Jacobs, Jane

1961 *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 New York: Vintage Books.

Jonas, Andrew E. G., and David Wilson

1999 *The City as a Growth Machine: Critical Reflections Two Decades Later*.
In The Urban Growth Machine: Critical Perspectives Two Decades Later.
Andrew E. G. Jonas and David Wilson, eds. Pp. 3-18. Albany: SUNY
Press.

Logan, John, and Harvey Molotch

1987 *Urban Fortunes: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Plac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Lu, Hsin-yi

2002 *The Politics of Locality: Making a Nation of Communities in Taiwan*.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Massey, Doreen

1994 *Space, Place, and Gender*.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Mbembé, Achille

2001 *On the Postcolon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Merrifield, Andy

2002 *Metromarxism: A Marxist Tale of the City*. New York: Routledge.

Polsby, Nelson W.

1963 *Community Power and Political Theory: A Further Look at Problems of
Evidence and Inference*.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 Scott, James C.
1990 *Domination and the Arts of Resistance: Hidden Transcript*.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 Smith, Neil
1996 *The New Urban Frontier: Gentrification and the Revanchist City*. London: Routledge.
- Smith, Neil, and Peter Williams, eds.
1986 *Gentrification of the City*. Boston: Allen & Unwin.
- Tarrow, Sidney
1998 *Power in Movement: Social Movements and Contentious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Tönnies, Ferdinand
2002[1957] *Community and Society*. Mineola: Dover.
- Turner, Victor W.
1996[1957] *Schism and Continuity in an African Society: A Study of Ndembu Village Life*. Oxford; Washington, DC: Berg.
- Vincent, Joan, ed.
2002 *The Anthropology of Politics: A Reader in Ethnography, Theory, and Critique*. Malden, MA: Blackwell Publishers.
- Wikan, Unni
1993 *Beyond the Words: The Power of Resonance*. In *Beyond Boundaries: Understanding, Translation and Anthropological Discourse*. Gísli Pálsson, ed. Pp. 184-209. Oxford; Providence: Berg.
- Wirth, Louis
2002[1938] *Urbanism as a Way of Life*. In *Urban Life: Readings in the Anthropology of the City*. George Gmelch and Walter P. Zenner, eds. Pp. 65-82. Prospect Heights, IL: Waveland Press.
- Wolf, Eric
2002 *Facing Power—Old Insights, New Questions*. In *The Anthropology of Politics: A Reader in Ethnography, Theory, and Critique*. Joan Vincent, ed. Pp. 222-233. Malden, MA: Blackwell Publishers.

莊雅仲

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人文社會學系

30010 新竹市大學路 1001 號

ycc622@mail.nctu.edu.tw

Neighborhood Watch: Power, Conflict and Urban Local Politics

Ya-chung Chuang

Department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College of Hakka Studies

National Chiao Tung University

This article investigates urban neighborhood politics in Yongkang, western Taipei and how local power plays and competition impact community development. This investigation proceeds from issues of personal choice, organizational transformations, and informal social networks to explore local rivalries and understand strategic decision-making and the idea of community over the course of such competition. Although rivalries often bring out intense dislikes and taboos they must be considered in terms of a community's search for meaning; so the mutual implication of rivalry and the urban community's political economy is indicative of both individual and collective emotions. This piece appraises the relation between local rivalries and community development in both a cultural and economic context.

Keywords: power, conflict, city, community, place
